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观念的变化

Chinese Changes in Idea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穆光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北京 100872)

毫无疑问,人们观念的变化要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并终究要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观念的变化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但这些变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影响到千家万户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理论上说,中国社会的计划生育追求的是少生优生。由于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多种手段——行政控制、宣传教育、知情选择、优质服务等,所以计划生育实际上已经成为影响人们观念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行为。

一、生育观

有许多调查都证明,中国人的生育观在过去 20 来年中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所谓生育观,实际上就是对生育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包括了生育动机(为什么要生或不生)和生育偏好(生育的数量偏好、时间偏好和性别偏好)两个层面的内容。从这样的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通过计划生育所引发的生育观的革命,首先就是生育的动机有了弱化的趋势,因为改革开放拓展了人们的成就空间,多元化的价值实现途径使得人们淡化了对生育价值的追求,人们对个人的发展和享乐越来越看重,生育的重要性在一些“先锋人口”的身上已经退居其次,晚育和不育文化的出现对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次,在生育的数量偏好上,从过去的多子多福到现在的儿女双全甚至“只要优秀、一个也够”的观念;在生育的时间偏好上,过去的做法是早育密育,现在忙于脱贫致富和个人发展等因素而推迟生育、间隔生育的做法在农村越来越多;在生育的性别偏好上,重男轻女的观念有所淡化,而生男生女一个样的观念日渐普遍。由于多年的濡染,传统观念的确在大一统的计划生育环境中被逐步消解了。

计划生育使我们看到了多子女家庭和少子女

家庭在人均福利上的差距,也使做父母的感受到了多生的弊和少育的利之间的反差。俗话说得好:有比较,才有鉴别。社会计划生育的开展使所有潜在的生育决策者都有了可靠的参照系。至少在发达地区,我们已经观察到:为了传宗接代而生育的观念已经大大淡化,而为了增进夫妻感情、活跃家庭气氛的生育观念明显增多。也就是说,孩子对父母的愉悦价值和精神收益被大大加强。这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计划生育的产物。

生育是为了什么?生育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传统的生育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工具性,生育就是责任和义务的代名词,生育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祖宗和面子。生育观变革的基本走向则是:不是为了祖宗的香火,而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进步和人的尊严。家族本位的生育向个人本位的生育的过渡最好地说明了生育的理性和理性的生育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就动摇了传统性的根基、培育了现代性的土壤。生一个孩子容易,但养一个孩子就不容易了,而要教育好一个孩子使之成才则更不容易。一项题为“改革 20 年天津青年结婚消费变迁”的调查发现,1999 年 1 月结婚的夫妻平均的结婚消费是 1978 年前后的 48 倍!特别有意思的是,20 年前,结婚青年的父母平均出资为 588 元,现在则达到了 23 773 元。“生育得不偿失、代际关系倾斜”的观点再次得到了支持。正是出于生育成本和利益预期的理性比较,生育决策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得到了体现。总括来看,对生育主体自身幸福的考虑、对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生存权益的考虑以及对生育的外部性(即对家庭以外的外部世界的影响)的考虑已经成为现代生育决策三维有机价值尺度的价值尺度。

二、婚姻观

计划生育赋予了婚姻更丰富的内涵。过去,婚姻和生育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个人的感情是次要的,结婚生子、传宗接代才是重要的。所以,只要

婚姻与生育的行为实现了这样的伦理价值,那么再没有感情的婚姻、再没有人性的婚姻都能够找到它存在下去的理由。然而社会性的计划生育通过少生,拓展了婚姻的天空,甚至婚姻和生育出现了分离的倾向。至少,婚姻不一定需要生育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的现象是越来越普遍了。

既然婚姻的工具性淡化了,那么两性之间的愉悦功能就有了发挥的余地。婚姻不再为生育所累,婚姻的主体自然也就不再为生育所奴役。计划生育帮助中国人的婚姻找回了它丢失千年的本来价值。简单说,婚姻是因为爱,也为了爱,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它对孩子和社会的责任。合则留,不合则去。婚姻不再是人性的枷锁,反倒成了人性进化的阶梯,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正如恩格斯 100 多年前所指出的:“在今天,婚姻这种不可离异性已经遭到了千万次的破坏。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那么只有继续保持爱情才合乎道德。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已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对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

离婚率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仅 1982 年到 1990 年 8 年间我国女性离婚率就上升了 40%,这是社会变迁的重大趋势。在发达国家,不婚人口的比例也在明显上升。譬如,根据英国社会保障统计部门的一项最新预测,按目前的趋势,英国的已婚成年人口将在未来的 10 年里成为少数,未婚和独居的成年人口将在总人口中占多数。这将是 1801 年该国开始有人口普查记录以来,首次出现同居、离婚、丧偶和从未结过婚的成人数量超过已婚人口的情况。这反映了人们对婚姻的看法。随着结婚就是为了生育以及从一而终等观念的突破,再婚在中国成为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1985 年全国只有 50 万人登记再婚,1996 年却达到 86.2 万人。在登记结婚的总数中,再婚人口的比例已经由 1985 年的 3.05% 上升到 1996 年的 4.61%。京、津、沪三市 1996 年再婚人口占结婚人口总数的比例更是分别高达 14.67%、10.08%、13.36%。

三、家庭观

结婚和生育是形成家庭的基本条件。由于一胎化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夫妇接受了小家庭的概念。事实上,多生多育是累赘、少生优育是福气的观念被广泛传播。甚至在一些农村地区,我们都能看到领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家庭的功能是什么?这是每一个进入成家立业的人们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的问题。古人说:食色,性也。其实,家庭就是为了满足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人性的需要。概括地说,在中国的文化架构中,生育与家庭的关系体现在:年轻时,是为了对得起父母和长辈(如

传宗接代),也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如天伦之乐);年老时,则是为了满足养老需要(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照料的)。家庭的一个基本功能依然是通过生育完成人类“种”的繁衍和文化遗产的使命。在过去,繁重的生育劳动和生活的苦难是千千万万的平民家庭难以摆脱的命运。而社会性的计划生育却通过降低非意愿生育率拯救了无数的家庭,使它们走上了更人性化的发展轨道。人性是在进化还是在退化?是解放的还是禁锢的?计划生育与家庭的关系给出了新时代的答案。

由于计划生育多年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增强了对人口国情的了解,并因此滋生出了对国家和社会在生育问题上的责任感。生育不再被看作是完全私人的行为,而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关联着社会的命运和前途。这样,所谓的“丁克家庭”、“俩人世界”在中国也慢慢出现了。少育文化和不育文化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市场。

四、养老观

计划生育本身就是对养老观最大的一个冲击。在传统的生育观念中,“养儿防老”是一个重要的考虑。计划生育却逼迫人们重视起自我养老、储蓄养老的做法。事实上,一些调查已经证实,独生子女父母对生育的养老保障功能所寄予的期望并不高。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少子女老龄化”是一个家庭结构的变迁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加以整合的一个概念,是一个考虑到家庭人口资源的稀缺化和家庭养老出现危机之间相互联系的有用概念。“少子女老龄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生育的养老保障功能已经弱化。生育问题在生育主体进入老年以后就是一个养老的问题。这种前后向关系告诉我们,养老观的变革将有助于生育控制问题的解决。

在现代社会,生育的净效用总的趋势是缩小的。所以,如果问计划生育以来人们的养老观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我的判断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要依靠生育资源来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渐被依靠自身的健康资源、经济资源和关系资源来养老的观念所替代。21 世纪是控制人口、节制生育的世纪,也是崇尚自求多福、自我积极养老的世纪,积极开拓养老的社会化空间正在成为时代的潮流。

五、教育观

多年的社会计划生育也在悄悄地改变人们的教育观和成才观。在传统的社会里,人们追求早生早育、多生多育,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社会,“人多势众”是千古不变的本土化真理,人们要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就

绝对不能忽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的影响。费老所说的“差序格局”是指反映整个社会结构基本特性的一种格局,画龙点睛的是一个“伦”字。以“己”为中心,推己及人所产生的差序,一圈圈推出去,社会关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个差序格局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就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结成的亲属网络。人们重视生育,是因为血缘和姻缘连接着彼此的关系、整合着血亲的力量,但农耕文明没有给大家锻造出宽广的成就空间,而且由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较高的死亡率水平,人们只能用数量换取质量的生育策略来图谋生存和发展,“人力”成了最基本、最可靠、最重要的资源。然而,发轫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前所未有的生育控制则严格地限制了人们生育的数量,传统意义上的生育竞赛被人为地阻断了。因为大多数人处在同样的起点上,于是人生的竞争、生活的竞赛,就不得不在孩子的质量上分出高下。这,恐怕是教育观和成材观有所变革的不可忽视的一个理由。

那么这种种变革现出了怎样的端倪呢?大致说来,不外乎以下几点。

(1) 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合格的教育是成人成材的必由之路。人们看到:无论是对家庭、对自己还是对孩子来说,“共同的未来”与其说取决于生育的数量,不如说取决于生育的质量。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生育”是一个包含了“生”与“育”两个环节、两个过程的一个大概念。“生”就求优生,“育”自当优育。放眼当今中国,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热情是极其高涨的,因为这个越来越依靠市场来决出胜负的社会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才标准、价值标准和成功标准。

(2) 独生子女新生代的出现使得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往昔的生育竞赛变成了今天的教育竞赛,这种变化首先是因为计划生育创造了人口学的基本前提——孩子不多,正好一个;如何作为,就在当下。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学习化社会帷幕的拉开使人们在拓宽了的成就空间里树立了大生育观,将对“生”的关注逐步转向了对“育”的关注。这就是计划生育在潜移默化中对国民素质的培育之功!

(3) 高学历、多技能成为教育投资的主要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非智力素质问题(主要涉及人格、情感、意志、成就动机、团队精神等方面)引起了许多家长的关注,甚至有理论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非智力素质的高低。这一观点最近又再次得到实证方面的支持。1999年,全国各省市区共有44名文、理科状元进入北大读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通过个案收集方式对其中的31名高考状元进行了研究,结果出人意料:这些天之骄子不少来自偏僻的农村,甚至他们的家人都没有什么文化。那么

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根本上是由于他们具备了比较完备和良好的非智力素质,表现在:积极的学习心态,勤奋刻苦的精神,牢固的知识基础和全面的知识结构,得当有效的学习方法,优秀的自学能力以及稳定并善于调整的心理素质。而这些素质的养成离不开科学的家庭教育,主要表现在:一是家长对孩子做人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正直;二是不要求孩子考多少分,只要孩子尽力就行;三是为孩子尽量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好;四是身教重于言教,几乎不打骂孩子,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始终不渝的望子成龙的心态下开始重视起科学的教育方式,从经验式教育转向理论化教育。虽然还有坎坷,但曙光已经出现。譬如,对于人们忧虑较多的独生子女新生代,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概括出了他们人格发展的五大优点,即重友谊、有恒心、求独立、有安全感和自信心,多数的社会道德表现良好,报答父母和报答祖国的需要强烈,兴趣爱好广泛。

六、健康观

计划生育是对中国妇女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解放。这种解放最初的标志就是广大育龄妇女在生殖健康上有了起码的保障。生育自古就是有风险,而少生少育则降低了这样的风险。特别是计划生育使非意愿的生育大为减少,中国妇女的风采也因此焕然一新。有很多的数据足以证明,中国妇女的健康水平和健康意识的确已非同往日。1995年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提出和实践直接给广大的育龄妇女带来了健康的效益。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以满足我国广大群众在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作为主要目的,许多试点地区以避孕节育的“知情选择”作为切入点,效果良好,既使群众在知情的基础上懂得如何选择并采取适合自己的避孕方式,又使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得到了提高。

中国“计生协”于1998年9月在河北省秦皇岛市进行了一项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和需求的调查,发现她们自我保健的意识和需要都非常紧迫。她们对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排序依次为:妇女五期保健、性传播疾病防治知识,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知识,妇女病防治,优生优育和儿童保健及教养知识。但与此同时的一个严峻事实是,育龄妇女对生殖健康基本知识、妇幼保健知识十分欠缺而生殖健康的程度又很低。在调查中发现,患各种妇科病的育龄妇女占43.68%,说明几乎一半的育龄妇女被妇科病所困扰,约一半妇女不知道也不懂得经期卫生和自我保健知识,约1/3的妇女从未做过妇科检查。这种反差恰恰说明了计划生育在新的历史阶段

所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的抽样调查也发现,非意愿生育现象没有完全杜绝——在采取过避孕节育措施的已婚育龄妇女中,25.2%的人有过避孕失败而导致怀孕的经历,说明计划生育服务的空间还很大。

无论如何,计划生育中的广大中国妇女对自身健康问题的关注意识是觉醒了。生育的解放还标志在时间的宽余上。多生多育之累在农村也已经一去不返。笔者在一些并不太先进的农村调研时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解放对于妇女身心健康的意义。时间上的宽余使得妇女可以在合理的组织下参与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她们作为独立的生活个体开始活出了尊严和价值。简单说,她们不再是繁重的生育劳动的奴隶,而逐渐成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城市,我们看到了更加璀璨的风景。城市女性群体所展示出的活泼泼的生命景象使我们看到了从生育的重压下完全解放的妇女们美好的生活。在个人发展的概念中,“健康”往往被人们看作是基础性的发展。中国妇女不仅有时间,也有条件使自己更加风姿绰约起来。投资健康并从中获得收益的妇女越来越多。

七、消费观

从家庭消费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如何消费闲暇时间和经济资源的问题。在理论上,计划生育的推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家庭闲暇时间和经济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幅上升。199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425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2倍。如果将观察的时段拉长,那么国家计委重点研究课题《人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结论是可以参考的,即1998年我国人民的消费质量指数比1952年提高了5.6倍。但消费观归根结底是一个消费的价值取向问题。人们崇尚知识、文化、自由和尊严,是消费观变革的必然走势。现代消费观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从对提高生活水平的关注提升到对改善生活质量的关注。人们不仅关注生活的硬件设施的完善,而且越来越关注精神文化的消费。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关注“我”拥有什么物质条件,而且关心什么样的消费结构才能使“我”的满意度最高。这种消费观的变革对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建设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消费与生活方式、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是衡量生活质量最常用的指标,那么这一指标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呢?1978~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7.7%降到了44.5%,农村则由67.7%降到了53.4%。特别是用于娱乐、教育、文

化、服务消费的支出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8年城镇人均已经达到500元,占消费支出的11.5%,农村居民人均159元,占消费支出的6.5%。文化消费的内容明显增加,这是最重要的变化。

我们实行计划生育,在宏观上固然是要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出良好的人口环境,但微观上的目标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就是建设文明、幸福的小家庭。计划生育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消费革命创造了人口学的条件。因为对生育的投资是生活消费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少生优生的做法在经济学上就是为家庭福利的增进提供了一条可行的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路径。在同样的投资条件和消费能力下,少生成了通过消费之链增进家庭福利的重要途径。在理论上,这里有一个家庭的实际的养育力和可能的消费力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只有将消费力保持在养育力之下,家庭的发展才可能是持续的,但我们知道,家庭的人口规模和一定的消费标准决定了实际的消费力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数值,这样的话,一旦符合基本需求和基本尊严的消费力超过了养育力,家庭就会陷入经济上的困境。显然,人们消费观的变革是需要条件的,其中生育的革命为大家创造了最必须的条件。这是无疑义的。

时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在广泛流播,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的要害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离不开消费的,消费是人类自身生命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如何消费就成了相当关键的一个问题。以笔者之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是亲生态、亲知识、亲文化的,我们消费不仅是为了人类自身生命的再生产,而且必须考虑资源环境系统的承受力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命再生产过程。“以人为本”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而是生态文明基础上实现的人的消费、人的满足和人的发展。

八、人生观

当代中国人重读书求发展正在成为时尚。个人的发展将不再依靠传统的方式,如早生贵子、母凭子贵等来实现,而是通过现代的方式,即增强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来增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来实现。计划生育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使中国妇女从早婚、早育、密育的羁绊中逐渐地摆脱了出来,成为生育的主人和生活的主人。中国新一代的育龄妇女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来充实自己、美化生活。妇女受教育水平明显上升。1997年,我国15岁以上女性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为6.41年,比1990年提高了近1年,快于同期男性增幅;女性成人文盲率由1990年的31.93%减少到1997年的

国家创新体系下的研究生教育

Postgraduate Edu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肖 念

(华中科技大学高教所,在职博士研究生 武汉 430074)

沈 红

(华中科技大学高教所,教授、博士 武汉 430074)

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及其主要特性

“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弗里曼于1987年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中首次提出和使用的。弗里曼的这一概念已为OECD组织正式接受,并于1996年的报告中提出与弗里曼的定义大致相似的定义:“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改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体系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尽管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唯一定义,但就其最实质性的组成而言,国家创新体系是由政府和社会各部门组成的一个组织和制度网络。它应是一个完整的开放的体系,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应用系统、创新人才培养系统和社会支

撑服务系统。其基本功能是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应用。

从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及其特性中,笔者想强调两方面:一是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重要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执行主体

研究生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仅是一个范围极小的概念,因为它仅仅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之所以把概念范围不对等的两者放在一起研究,一方面是由于,从研究生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及其特征看,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重要

23.2%;女童与男童入学率之差由1990年的2.91个百分点减少到1997年的0.21个百分点;全国女研究生、女大学生有124万人,分别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0.35%和36.42%;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63%;在各类成人教育中,女性所占比例已经达到45.63%。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浙江省新闻出版局主持的我国首次“全国国民阅读倾向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当代社会中,阅读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书报杂志,而成为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媒体实现的过程。特别值得欣喜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读书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调查报告显示,77.7%的人认为在当代社会,读书的作用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重要。根据推算,我国18~70岁的国民中,大约有4.87亿人每月至少读一次书。

我国国民的阅读倾向主要归结为三种类型:“学习者”、“阅读者”和“观看者”(或者“看电视者”)。看电视是我国绝大多数国民每天要进行的闲暇活动,每天看电视的人为92.3%,其次是读报纸,为53.7%,看杂志、看书(不含教材)、听广播分别为38.8%、37.8%和36.9%。我国有藏书的家庭占62.5%,低于韩国1995年藏书家庭的比例(96.9%)。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个人的文化素质和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满足。

在过去,中国人的人生幸福观可以说就是生育的幸福观,人生的成功或者幸福总是千丝万缕地与生育活动相吻合。现在则大不相同,人们不再认为生育就是获取人生幸福的根本。

(责任编辑 孙立明)